文章编号:1000-5404(2010)10-1071-03

论著

重庆市中学生抑郁状况及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性研究

李雷雷[1],汪 洋[1],王 宏[1],徐鸣明[2] (400016 重庆,重庆医科大学:妇幼保健与儿童少年卫生教研室[1],神经科学研究中心[2])

[摘要] **目的** 调查重庆市中学生的抑郁状况与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方法** 采用Zung抑郁自评量表(SDS)和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rait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TCSQ),对重庆市1 596名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重庆市中学生抑郁发生率较高(58.4%),抑郁总分(41.20±7.83)及各因子[精神性障碍(3.30±1.36)、躯体性障碍(15.19±3.01)、精神运动性障碍(4.43±1.25)及心理障碍(18.27±4.70)]与应对方式[积极应对方式(29.5±8.5)与消极应对方式(23.0±7.8)]在不同性别、年级及学校类型上有所不同;中学生抑郁总分及各因子得分与积极应对方式(除精神性障碍因子外,r分别为-0.483、-0.267、-0.272、-0.553,$P<0.01$)和消极应对方式(r分别为0.242、0.618、0.175、0.190、0.098,$P<0.01$)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应对方式是中学生抑郁发生的有效预测因子。**结论** 重庆市中学生抑郁状况与应对方式之间存在显著相关,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可以有效降低抑郁的发生率。

[关键词] 抑郁;特质应对方式;回归分析;横断面调查;心理卫生
[中图法分类号] G478; R395.6; R195.1 **[文献标志码]** A

Relationship between depression and trait coping style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of Chongqing

Li Leilei[1], Wang Yang[1], Wang Hong[1], Xu Mingming[2] ([1]Department of Maternal and Child Care and Adolescents Health, [2]Institute of Neuroscience,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16,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pression and trait coping style in Chongqi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Methods**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 and Trait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TCSQ) were adopted in the study to test the randomly sampled 1 596 middle school students of Chongqing. **Results** Students' depression rate was a little bit high (58.4%). The differences in depression (41.20±7.83), other factors [psychological disorder (3.30±1.36), physical disorder (15.19±3.01), psychomotor disturbance (4.43±1.25) and mental disorder (18.27±4.70)], and trait coping style [positive coping style (29.5±8.5) and negative coping style (23.0±7.8)] was significant among genders, grades and school types. Students' depression was in correlation with positive (besides psychological disorder factor, r=-0.483, -0.267, -0.272, and -0.553) and negative coping style (r=0.242, 0.618, 0.175, 0.190, and 0.098) in different degrees. Coping style was a valuable predictor of students' depression. **Conclusion** Students' depression i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to trait coping style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Positive coping style can reduce the rate of student's depression.

[Key words] depression; trait coping style; regression analysis; cross-sectional studies; psychological health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High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of China (863 Program, 2006AA02Z427), and the National Basic Research Program (973 Program, 2009CB918302). Corresponding author: Wang Hong, Tel: 86-23-68485850, E-mail: Wangh111111@yahoo.com.cn

抑郁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一种常见的负性情绪,是机体适应环境过程的一种反应[1]。中学生正处于青春期,其生理、心理的变化都具有其特殊性,也使得中学生更容易发生情绪障碍等问题[2]191。应对是个体为了处理被自己评价为加重或超过其能力资源范围的特定内外环境的要求而作出的不断变化的认知与行为努力[3]。应对作为应激与健康的中介机制,对身心健康的保护起着重要作用。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对重庆市中学生的抑郁状况及其所采用的应付方式进行了调查分析,试图探讨中学生抑郁与其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为中学生的身心健康的教育提供依据,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二阶段整群抽样的方法。首先从重庆市九龙坡区随

[基金项目] 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2006AA02Z427);国家重点研究发展计划重大专项(973计划,2009CB918302)
[通信作者] 王 宏,电话:(023)68485850,E-mail:Wangh111111@yahoo.com.cn

机抽取城乡中学各一所;第二阶段,以小班为单位进行整群抽样,对城乡中学(初一、初二、高一、高二)选取4~5个班,每个班所有学生都纳入调查,本次调查发放问卷1 630份,实际调查1 608名中学生,回收问卷1 596份。其中男生809名,女生787名;初中生765名,高中生831名;城区学生818名,农村学生778名。

1.2 方法

1.2.1 抑郁症标准 采用Zung抑郁自评量表(SDS)评价中学生的抑郁状况。SDS由20个问题组成,每个问题代表着抑郁症的1个症状特点,按1~4级评分。20个条目反映抑郁状态4组特异性症状:①精神性-情感症状;②躯体性障碍;③精神运动性障碍;④抑郁的心理障碍[2]195。抑郁指数计算公式:抑郁指数=总分(得分)/总分满分(80)。指数与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的关系如下:指数在0.50以下:正常范围(无抑郁症状);指数在0.50~0.59:轻度抑郁;指数在0.60~0.69:中度抑郁;指数在0.70及以上为重度至严重抑郁[4]。

1.2.2 应对方式量表 采用特质应对方式问卷[2]120-121,该问卷共包括了20个条目,分为消极应对(negative coping, NC)与积极应对(positive coping, PC)2个因子,各包括10项条目。所有的条目按照从不这样、很少这样、有时这样、常常这样与总是这样5级计分。

1.3 资料收集

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以班级为单位指导中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认真、独立、如实填写问卷,当场作答,当场回收,当场核查。

1.4 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统一使用Epidata3.02录入软件进行录入,使用SPSS 13.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抑郁及应对方式在不同性别、年级及学校类型的差异采用t检验;抑郁与应对方式之间的相关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抑郁与应对方式之间的回归采用线性逐步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研究工具的信度与效度分析

2.1.1 信度分析 SDS量表的总分及4个症状分组的Cronbach's α系数在0.522~0.901;TCSQ问卷的总分及2个因子的Cronbach's α系数在0.841~0.839之间,分半信度系数在0.701~0.754。说明本研究的2个量表具有较好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2.1.2 效度分析 SDS量表的总分及4个症状分组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691~0.932,而各个症状分组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431~0.567,各症状分组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各分组与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TCSQ问卷的总分与各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759~0.801,而2个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358,两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小于两因子与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经过因素分析[4],所有条目在各自因素上的符合均大于0.45。NC和PC的相关系数仅-0.09,呈低相关性,说明本研究的2个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2.2 中学生抑郁的基本特点

在1 596名被调查的学生中,抑郁的得分为(41.20±7.83),精神性障碍得分为(3.30±1.36),躯体性障碍得分为(15.19±3.01),精神运动性障碍得分为(4.43±1.25),心理障碍得分为(18.27±4.70)。其中有抑郁症状的中学生人数为929名,检出率为58.2%。其中轻度抑郁530名,检出率为33.2%,中度抑郁364名,检出率为22.8%,重度抑郁35名,检出率为2.2%。

男生的精神障碍评分低于女生,但其心理障碍评分高于女生($P<0.01$);与高中生相比,初中生精神障碍因子评分低于高中生,但其心理障碍因子评分高于高中生($P<0.01$);城区中学生的精神性障碍因子分高于乡镇中学生,但其精神运动性障碍及心理障碍因子分低于乡镇中学生($P<0.01$);而抑郁总分、躯体性障碍因子分、精神运动性障碍因子分在不同性别、年级与学校类型之间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1。

表1 不同性别、年级及学校类型学生抑郁总分及各因子分比较 ($\bar{x}\pm s$)

因素	抑郁总分	精神性障碍	躯体性障碍	精神运动性障碍	心理障碍
性别					
男	41.23±7.71	2.96±1.17	15.20±3.02	4.46±1.23	18.60±4.82
女	41.18±7.97	3.67±1.44[a]	15.18±3.00	4.40±1.27	17.93±4.55[a]
年级					
初中生	41.34±8.07	3.18±1.39	15.13±3.04	4.37±1.29	18.65±4.89
高中生	41.08±7.62	3.42±1.32[a]	15.25±2.99	4.48±1.21	17.92±4.50[a]
学校类型					
城区	40.87±7.99	3.43±1.40	15.17±3.06	4.36±1.30	17.91±4.74
乡镇	41.55±7.65[a]	3.18±1.30[a]	15.21±2.97	4.49±1.19[a]	18.65±4.63[a]

a: $P<0.01$,与相应男生、初中生、城区比较

2.3 中学生应对方式的基本特点

所有被调查的中学生中积极应对方式得分为(29.5±8.5),消极应对方式得分为(23.0±7.8)。在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的得分上,女生要高于男生($P<0.01$);初中要低于高中生($P<0.01$);城区中学中学生积极应对得分要高于乡镇中学的中学生,但消极应对方式得分正好相反($P<0.01$)。见表2。

表2 不同性别、年级及学校类型中学生应对方式比较 ($\bar{x}\pm s$)

因素	积极应对方式	消极应对方式
性别		
男	28.12±8.91	20.89±7.56
女	30.85±7.83[a]	25.16±7.46[a]
年级		
初中生	28.08±9.12	21.22±8.07
高中生	30.74±7.67[a]	24.64±7.18[a]
学校类型		
城区	30.03±8.34	23.50±7.79
乡镇	28.87±8.63[a]	22.47±7.79[a]

a: $P<0.01$,与相应男生、初中生、城区比较

2.4 中学生抑郁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性分析

除了精神性障碍这一因子外,中学生的抑郁总分及其他各因子(躯体性障碍、精神运动性障碍及心理障碍)与积极应对方式均呈负相关(r分别为-0.483、-0.267、-0.272、-0.553,$P<0.01$);中学生的抑郁总分及各因子(精神性障碍、躯体性障碍、精神运动性障碍及心理障碍)与消极应对方式均呈正相关(r分别为0.242、0.618、0.175、0.190、0.098,$P<0.01$)。

2.5 中学生抑郁与应对方式的逐步回归分析

以抑郁评分为因变量,以应对方式各条目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条目15(我比平时更容易激怒)、条目

17(我感到自己是有用的和不可缺少的人)、条目 11(我的头脑像往常一样清醒)、条目 5(我吃饭像平时一样多)、条目 4(我夜间睡眠不好)、条目 1(我感到情绪沮丧、郁闷)、条目 10(我无故感到疲劳)、条目 20(我仍旧喜爱自己平时喜爱的东西)、条目 16(我觉得决定什么事很容易)、条目 9(我的心跳比平时快)、条目 14(我对未来感到有希望)、条目 12(我做事情像平时一样不感到困难)、条目 8(我为便秘而烦恼)、条目 18(我的生活很有意义)、条目 19(假若我死了比人会过得很好)与条目 6(我与异性密切接触时和以往一样感到愉快)进入对抑郁评分的回归方程,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3 讨论

本研究所使用的抑郁量表和应对方式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重庆市中学生中抑郁的检出率比较高(58.4%),高于国内外其他研究所报道的青少年(中学生)人群的抑郁的发生率[5-7],这可能与研究所选样本及量表评定方法的不同有关,本研究无法说明初三与高三部分学生的抑郁检出情况,这是本调查的一个局限。虽然未发现男生与女生的抑郁发生率存在差异,但是男生与女生在精神性障碍与心理障碍方面存在差异,其中精神性障碍主要表现为抑郁心境和哭泣,女生较男生更容易出现精神性障碍,而心理障碍主要表现为思维混乱、无望感、易激惹、犹豫不决、自我贬值、空虚感、反复思考自杀和不满足等[8],男生较女生更容易出现。同时我们发现,城区中学生与乡镇中学生之间抑郁发生情况也不相同,乡镇中学学生要高于城区学生,这与其他地区中学生抑郁情况有所不同[9],而且城区中学生与乡镇中学生在精神性障碍与心理障碍方面也存在显著性差异,这可能由于乡镇学生所承受的升学压力比较大,不能很好的调整自己的状态所致。而不同年级之间的抑郁发生状况也不同,初一与高一年级的抑郁发生率明显高于初二与高二年级的抑郁发生率,该结果与周琳琳等[10]的研究有所不同,这可能是因为初一及高一年级中学生进入一个新的环境,心理调节能力比较弱,不能尽快地适应新的环境所致。其他方面不同性别之间未发现其统计学意义。

同时,我们发现重庆中学生更多的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这也与其他相关研究基本一致[11]。传统观念认为女孩子遇到问题时更多的倾向于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但我们发现,女生比男生更多的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同时,我们也发现,女生采用消极应对方式要高于男生,随着传统性别观念的逐渐淡化,女孩子更多体现出与男孩子应对问题的态度,但这种转变有一定的局限性。另外,我们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突出的出现在一个群体。这可能由于一方面城区中学生所处的教育环境要优于乡镇中学生,使其能够更多的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面对各种问题,但由于城区中学生竞争压力大,各种培训班、补习班的增多,使城区中学生心理出现波动,会产生厌学等消极的应对方式面对各种困难。但由于选样的局限,也可能会导致结果出现了矛盾之处,需要扩大样本量进一步两者之间的关联。

本研究结果显示,中学生抑郁水平与应对方式存在密切的关联,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的中学生其抑郁水平要低,而使用消极的应对方式的中学生,其抑郁水平相反,这与某大学的大学生的研究结果相一致[12]。进一步以应对方式各因子为自变量,以抑郁评分为因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发现,应对方式能解释抑郁评分 43.6% 的方差变异,表明不同的应对方式对中学生的抑郁水平有较高的影响,中学生使用积极地应对方式能够降低中学生的抑郁水平,而消极的应对方式则相反,因此可以通过调整应对方式的方法来降低中学生抑郁的程度。

但是,应对方式对抑郁水平的预测是有限的,只能预测中学生抑郁总分方差变异的 43.6%,这是因为应对方式只是影响中学生抑郁的一个变量,还需要更加深入从多个方面对中学生抑郁的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1] Enns M W, Cox B J, Borger S C. Correlates of analogue and clinical depression: a further test of the phenomenological continuity hypothesis [J]. J Affect Disord, 2001, 66(2/3): 175-183.
[2] 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M]. 增订版. 北京: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1999.
[3] Lazarus R S, Folkman, S. Stress, Appraisal and Coping[M]. 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1984: 141.
[4] Zung W W. A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J]. Arch Gen Psychiatry, 1965, 12: 63-70.
[5] 张洪波, 陶芳标, 曾广玉, 等. 安徽省中学生抑郁心理症状及其相关因素[J]. 中国学校卫生, 2001, 22(6): 497-498.
[6] 温圆圆, 张建新, Paula, 等. 成都市中学生抑郁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J]. 现代预防医学, 2009, 36(7): 1302-1304, 1307.
[7] Saluja G, Iachan R, Scheidt P C, *et al*. Prevalence of and risk factors for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young adolescents[J]. Arch Pediatr Adolesc Med, 2004, 158(8): 760-765.
[8] 魏娟娟, 冯正直, 卢稳娜. 不同程度抑郁状态大学生反事实思维特点的初步研究[J]. 第三军医大学学报, 2009, 31(11): 1098-1101.
[9] 徐斐, 王晨阳, 李解权, 等. 南京地区中学生抑郁障碍及其影响因素的流行病学研究[J].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06, 27(4): 324-327.
[10] 周琳琳, 范娟, 杜亚松. 上海市中学生抑郁症状现状及其与生活事件关系的研究[J]. 上海精神医学, 2009, 21(3): 133-135.
[11] 王极盛, 丁新华. 初中生主观幸福感与应对方式的关系研究[J]. 中国公共卫生, 2003, 19(10): 1181-1182.
[12] 曹显明, 余跃生, 何学华, 等. 应付方式与焦虑、抑郁的相关性研究[J]. 时代教育: 教育教学刊, 2008, (5): 80, 98.

(**收稿**:2009-11-25;**修回**:2010-01-06)
(编辑 王小宴)